

英语在世界各国的变化和发展的特点

[摘要] 在研究 Kachru 的英语世界化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主要研究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在世界各国的变化和发展的特点,指出世界英语是在多元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发展并变化着的语言,并形成了各种带有不同地域色彩的语言变体。英语不再为所谓的“标准英语”使用者所独有,而是属于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世界各国的使用者。

[关键词] 世界英语;英语的变化与发展;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环境

Key words : World Englishes ; Global divers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glish ; Multicultural and multi - linguistic contexts

Abstract : Based on the study of Kachru's theory of World Englishes , this paper makes research on the global divers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t points out that World Englishes have been adapting to the multicultural and multi - linguistic contex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nations and have evolved into a diversity of language varieties with multiple regional colours. The ownership of

English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speakers of so - called "Standard English" but extends to people with variou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几个世纪以前,英语的使用还仅仅是局限在英伦小岛上,使用人数不过五到七百万。但如今,以英语作为非本族语使用的人却远远超过了以英语作为本族语使用的人,全世界至少有八亿人说英语。英语已经发展成一门全球性语言,被 60 多个国家作为主要语言或官方语言使用,并且成为打开各国边境之门的语言钥匙。英语在亚洲的使用也呈现了无法抵抗的上升之势。正如全球公认的英语世界化理论的开拓者 Braj Kachru 指出,目前,亚洲估计有 3.5 亿左右的人使用英语,几乎等于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三个国家人口的总和[1]。根据 Crystal 的估计,如果目前学英语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印度说英语的人将远远超过英国[2]。事实上,英语早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中介,它在世界各国的广泛使用和快速传播,并与各国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相互交融,使其带上了明显地方色彩,传递着各地独特的文化信息。英语在新的多元文化语境中深入渗透,使得英语产生了广泛的民族化现象,产生了各种新的英语语言变体,从而被称为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英语已不再是英、美等国家所独有的语言,而是一种全球性语言。

1 Kachru 的世界英语理论

“世界英语”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语言学家 Braj Kachru 于 70 年代提出,用于指在世界各国得到发展并产生了变化的各种英语变体,如人们通过电视或其他渠道听到的来自不同的国家的人所说的各种英语,有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南非英语等。现在,我们可以经常听到非英语国家的人能够流利地说英语,但往往带有与标准英语不同的口音,还有不少人使用的是“本土化”的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的英语,其词汇和句法都欠标准,流利程度也较差。为了区分各种不同的英语,Kachru 提出了世界英语理论,认为世界英语在全球的传播、习得和发展情况可以用三个同心圈来区分,即:内圈、外圈和延伸圈。内圈国家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新西兰。内圈的人口最少,英语在这里是母语,也可称为第一语言,英语具有官方地位,是通过自然的方式习得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处于外圈的国家由英语国家的前殖民地组成,有孟加拉国、加纳、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南非、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外圈的人口比内圈的人口多,英语在这里是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 或 L2),其获得方式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英语在这些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地位,在多种语言(multi - lingual)和多元文化(multi - cultural)的环境中,经过长期的使用和发展,英语逐渐被民族化(nativized),变成当地的重要语言(如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发展

成为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的新英语。延伸圈涉及的国家和人口最多,有中国、俄罗斯、日本、南韩、以色列和南美等国家。他们均认识到了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的重要性,但英语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官方地位,所以只是作为外语(foreign language,或FL)使用,在教育、科技、外贸和外交等领域起辅助语言的作用。其获得方式是通过长期的学校教育而习得。根据Kachru的研究,三个圈内说英语的人保守点估计应有7到8亿,开放点估计则有20亿。在全球范围内,以英语作为非本族语使用的人与以英语作为本族语使用的人的比率约为4比1。这些数据说明,英语已不再是处于内圈的以英语为本族语的国家所独有,全世界各地的人在双语或多种语言的语境中使用着英语,只是带有各种不同的语音语调,使用着不尽相同的词汇、句法和语篇结构而已。印度英语与标准的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大体相似,但它的语音体系却很独特,其词汇也有不少是印度英语中所独有的。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虽然有很多人使用其他的语言,但英语在这些国家几乎是作为第一语言来使用的。

2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发展与使用

早在20世纪60年代,Halliday和Greenberg等人就指出,英语不再为以英语为本族语的国家所独有,英语的各种带有地方色彩的变体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趋势还将继续下去[3]。在那些处于外圈的英国前殖民地国家,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比如说南非、印度、马耳他和新加坡等国。在这些国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早已成为其主要语言或官方语言,有效地担负着各种交际功能,尤其是在各种官方交际场合,英语更是取代了母语,逐渐被用于法律体系、教育体系、各地的行政管理、科技和商贸领域以及公共服务领域,英语已经成为人们获得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的主要工具。西非国家加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加纳大约有900万居民,使用50多种语言,但英语却是其官方规定的大、中学教育所使用的教学语言,该国几乎所有的公共领域都使用英语,其主要报纸都是英文版,公共电台也是大量使用英语。这种现象早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开始。现在,许多加纳人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课堂内外都鼓励学习和使用英语的环境中,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混杂的城市更是如此。现在,与将英语作为本族语使用的人相比,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人数增加得更快。据Graddol估计,以英语作为本族语使用的人口大约有3.75亿,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人也大概有3.75亿[4]。

3 特殊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语言

英语在外圈国家发展如此之快,自然有它的历史原因,但是也与英语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各国采取的外语教育政策分不开。世界英语是在特殊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语言。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在原英国殖民地国家,法律规定英语是统治阶级的语言,英语被强加给殖民地的人民,使英语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用于日常交往的第二语言。即使是在独立后,他们也很难用别的语言来取代英语了。尼日利亚人民以前虽不想要英语,但在1960年宣布独立的时候,他们发现英语已经成为他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国的宪法、法律和政府文件均是用英文写成,人民也习惯了使用英语并逐渐喜欢上了英语,他们只好继续使用带有明显尼日利亚民族色彩的英语。现在,对大多数尼日利亚人来说,英语已经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所说的英语是否是标准英语,他们宣布自己的英语独立,是标准的“尼日利亚英语”。现在的尼日利亚人认为,没有英语,这个国家将无法运行。正是英语,才使得尼日利亚成为尼日利亚。现在,英语被许多国家(如“Asean Countries”,东南亚国家联盟)用作官方联系语言,以促进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它也是全世界科学技术、商贸以及其他众多领域的主要语言,国际学术刊物上的科技论文绝大多数是用英文撰写的,现在的互联网至少有75%的网页使用的是英语,从而使互联网成为传播英语的最强大的媒介。在很大的程度上,英语就是金钱,美元和英镑投资走到哪里,英语也就跟到那里。新加坡政府为了发展对外经济,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进行的语言教育改革中,极力倡导双语教育,将英语定为官方第一语言,加大政府对英语教育的投入,

重新修订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的课程分配时间:英语占 33%、母语及道德教育占 27%、数学及其他课程各占 20%,使英语教学在小学阶段就占较大的比重[5]。新加坡的英语教育政策,使得英语教育成果显著,新加坡人民的英语水平普遍提高,现在大多数三、四十几岁的新加坡人均觉得使用英语思维远比使用各自的母语更为方便。新加坡经济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其公民的英语语言能力也应功不可没。虽然带有本土化特色的新加坡英语的标准性遭到许多人的质疑,但新加坡政府采取的语言教育政策和改革措施却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

4 英语作为外语在延伸圈的发展特点

信息产业的革命性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世界各国更进一步意识到了外语(尤其是英语)语言技能的创立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关键的意义。日本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技术强国,为什么在信息产业的发展中,其软件业不仅落在美国之后,甚至还掉在印度的后面?在很大的程度上,这应该归咎于日本国民的英语语言能力太差,远远比不上印度人的英语语言能力。因此,以前不重视外语教育的日本政府痛下决心,重新制订外语语言教育政策,在语言教育制度、课程设置和师资培训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注重培养语言学习者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张文友)[6]。近十几年来,其他的处于延伸圈的国家也同样在积极地进行英语教育改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国教育部新颁发的《国家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标准(3—12 年级)》提出了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相衔接的课程改革框架,大力推行小学、中学、大学英语教学“一条龙”的教育体制,规定小学三年级开始设置英语课,上海、北京、广州等有条件的大城市甚至将小学英语教学提前到一年级。可以说,我国英语学习的热潮一浪高于一浪,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也在逐步提高。在欧洲,根据欧盟的估计,1987 年只有三分之一的欧洲人会讲英语,而目前则有超过一半的 15 到 24 岁的欧洲人可以用英语进行交流,而且这种比例还在日益增加。Graddol 认为,把英语作为外语使用的人估计已超过了 7.5 亿。与外圈国家情况类似的是,英语在延伸圈国家的使用,也被发展成了各具特色的英语变体。在延伸圈国家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英语使用者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理解来使用英语,也使得英语得到了充分发展,使之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表现出特有的价值。出于新的多元文化生活环境的需要,人们必须给新的东西、新的关系或新的经验命名,必须表达新的意义、新的文化和新的观点,从而使英语在这些国家也产生了新的变体,出现了许多新的术语、新的语法特点以及新的表达方法。如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变体,也逐渐被语言学界和语言使用者所接受,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法如“four modernizations”(四个现代化)和“spiritual civilization”(精神文明)等,不仅中国人自己能理解,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人也能理解。进入英语标准词典和其他工具书的汉语借词至少已达 979 个(Cannon)[7],如“fengshui”(风水),“kong fu”(工夫),“taichi”(太极拳)等已被英语词典收录。目前,虽然中国英语在西方语言学界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但中国英语作为外语的英语变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引起了国内语言学界的研究兴趣。

“中国英语”这一概念,最早由葛传规先生提出,他认为“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8]。1991 年汪榕培认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并将中国英语定义为“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9]。李文中则认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10]。中国英语主要构成包括音译词、译借词以及独特的句式和语篇。”在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中,中国英语显示出其独特的语音、词汇和语篇特点,但对于以英语作为本族语者来讲,中国英语所表达的意思却是明白易懂的,并不会造成交际障碍,而且完全能够发挥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正如罗运芝所说,“作为英语的一种变体,中国英语虽然还没有被广泛接受,但已呈现了不可阻挡的趋势”[11],因为中国英语有

益于传播中华文化,并将随着中国人使用英语的普及和中国特色的形成而逐渐扩充,从而丰富和发展世界英语与世界文化。可以说,世界英语在全球的使用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其自身也在这种变化中变化着。

5 结束语

英语在全球各国的多元文化和多元语境中不断发展变化,使之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世界英语与各国语言文化的交融,产生了不同的语言变体,不同的语言变体在不同的语境里有效地实现着不同的交际功能。语言学习者有必要认识世界英语的发展变化情况,有必要认识到英语不再为所谓的“标准英语”使用者所独有,世界英语属于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世界各国的使用者。

[参考文献]

- [1] Kachru, Braj B. 1997. "World Englishes and English - using communities." In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7 : 66 - 87.
- [2] David Crystal .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 Cambridge UP , 1997. 130 - 134.
- [3] Halliday , M. , McIntosh , A. , &Stevens , P. (1964) .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Harlow: Longman.
- [4] Gaddol , D. 1997. The Future of English ? [M]London : British Council (1997 :10) 1
- [5] Dudley De Souza (1980) .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 Language planning in Singapore. [M] In Evangelous A. Ed.) ,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pp. 203 -232) . Singapore :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P. 203 - 2321
- [6] 张文友,日本英语教育的改革动向[J].《外语界》,2001年第5期,P. 341
- [7] Cannon , G. 1988. Chinese borrowing in English [J] . American Speech 63 :1 - 12.
- [8] 葛传规,漫谈由汉译英问题[J].《翻译通讯》,1980年第2期。
- [9] 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一期 1
- [10] 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 1
- [11] 罗运芝,中国英语前景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5期 1